

東南亞的恐怖主義者

● 莊禮偉

2002年10月12日，印尼巴里島發生了傷亡慘烈的恐怖爆炸案。大批驚魂未定的遊客選擇在海灘上過夜或趕緊回國，而爆炸案的策劃人、電腦工程師沙姆特拉 (Imam Samudra) 卻沒有迅速逃離，他冷靜地在巴里島逗留了四天，以觀察恐怖襲擊的效果。巴里島事件連同此前在科威特及也門海域發生的恐怖襲擊事件，形成了「9·11」事件之後最嚴重的一次恐怖主義活動高潮，隱匿多時的拉登 (Osama bin Laden) 也隆重通過卡塔爾半島電視台 (Al-Jazeera) 傳話，要求全球穆斯林發動聖戰。

巴里島爆炸案發生後，印尼警方宣布此案是東南亞跨國極端暴力組織伊斯蘭祈禱團 (Jemaah Islamiyah，以下簡稱祈禱團) 所為。案發後第一個被捕的嫌犯安羅茲 (Amrozi) 受審時提到漢巴里 (Hambali)、巴希爾 (Abu Bakar Bashir) 等人的名字，前者是祈禱團的暴力行動領袖和基地組織 (Al-Qaeda，又譯阿爾蓋達、凱達) 在東南亞的重要聯絡人，後者是祈禱團的精神領袖。

巴里島爆炸案及其後的新加坡未遂恐怖襲擊案顯露出一個以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南部和泰國

南部為活動區域，以祈禱團為組織紐帶的跨國恐怖網絡：漢巴里2002年初在泰國南部開會策劃巴里島爆炸案；曾在馬來西亞和泰國居住的安羅茲在案發後企圖逃往菲律賓南部避風頭，與那裏的極端主義組織關係密切；巴希爾在馬來西亞和印尼兩地傳教，使祈禱團發展壯大，安羅茲便是他在馬來西亞傳教時的忠實學生。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南部和泰國南部等地的恐怖組織基於種族、語言、宗教等因素互有緊密聯繫，同時它們又與基地組織有程度不一的聯繫。

很明顯，巴里島爆炸案不是一個孤立事件。它表明「9·11」事件之後國際恐怖主義勢力與西方繼續展開殘酷較量，本土的、跨國的恐怖組織愈來愈多，其攻擊目標也愈來愈全球化和多元化，既包括西方的官方設施和象徵物，也包括西方遊客扎堆的俱樂部和酒店，如在新加坡這樣的溫和國家發生。既然美國可以攻擊窩藏基地組織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權，那麼恐怖組織也可以攻擊窩藏美國海軍後勤基地的新加坡。

以基地組織為首的反西方恐怖組織採取的是「世界大戰」戰略——在全

以基地組織為首的反西方恐怖組織採取的是「世界大戰」戰略——在全球範圍內展開對西方的聖戰，徹底解決它們與「邪惡的西方文明」之間的宿仇、利益衝突和精神衝突。

球範圍內展開對西方的聖戰，徹底解決它們與「邪惡的西方文明」之間的宿仇、利益衝突以及精神衝突。基地組織極其渴望與西方陣營「全面對決」的到來。為此它們正在：一、通過恐怖襲擊樹立威望；二、聯絡世界各地的恐怖份子，壯大反猶太人及十字軍的國際聯盟，如果能把整個伊斯蘭世界都拖下水則更好；三、尋求多個庇護它們的伊斯蘭政府或地方割據政權的支持，並與它們協同對抗西方；四、既然要迎接「世界大戰」這一天，就不能不尋求「終極武器」（包括核武器和超級生化武器）。因此國際社會在將來某一天，可能會遭遇恐怖組織擁有核武器的局面。

由祈禱團製造的巴厘島爆炸案和「9·11」事件一樣，都具有鮮明的「精神戰爭」特質。巴厘島主要供西方人享樂的夜總會代表了一種與伊斯蘭教教義嚴重衝突的「頹廢」文化，而參與反基督教—猶太教的聖戰也代表東南亞恐怖組織具有了跨國的、全球的戰略視野：祈禱團牽頭成立了東南亞恐怖主義區域聯合組織——聖戰者區域聯盟 (Rabitatul Mujahidin)；已解散的印尼聖戰軍 (Laskar Jihad) 曾派大批武裝人員前往馬魯古群島幫助那裏的穆斯林進攻基督徒；巴厘島爆炸案嫌犯安羅茲聲稱他的犯案動機是仇恨美國人欺壓穆斯林；祈禱團領袖巴希爾呼籲其支持者對以色列和猶太人發動聖戰，用實際行動幫助巴勒斯坦兄弟。

一 伊斯蘭祈禱團：本土化的基地組織

「9·11」事件之後，基地組織潛逃到了哪裏？拉登是否還活着？巴厘島爆炸案發生後，這兩個問題都有了

答案。基地組織已經化整為零，通過「地下鐵路」前往兩類國家：伊斯蘭國家和西方國家。他們潛藏和前往的地方，都將成為反擊和騷擾西方的前線。而祈禱團就是基地組織在東南亞重要的代理人，甚至可以說，祈禱團就是東南亞本土化了的基地組織。由於西方國家反恐措施較嚴，基地組織及其同盟者的作戰地點主要在外圍，即利用某些伊斯蘭國家「群眾關係比較好」的有利環境，以「武工隊+當地合作者」的方式展開游擊戰，襲擊在當地的西方機構和西方人。同時巴厘島爆炸案也表明：「拉登」仍然活着——如果我們把有膽略也有謀略挑戰西方、能夠勝任製造驚天恐怖事件的那個人叫做「拉登」，那麼「拉登」顯然仍然活着，而且有很多。

如同巴基斯坦出現「巴基斯坦塔利班」一樣，東南亞也出現了克隆基地組織的活動模式與政治綱領（反西方、反基督教—猶太教、建立神權國家）、受基地組織指導的本土恐怖組織，祈禱團即是這樣的一個典型案例，其宗旨：一是要在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汶萊、泰國南部與菲律賓南部等地建立一個統一的伊斯蘭教國，二是要積極參與反西方的全球聖戰。因此祈禱團的暴力攻擊對象既包括西方國家，也包括阻撓他們建立泛神權國家的東南亞世俗國家政權。和阿布沙耶夫 (Abu Sayyaf)、菲律賓共產黨的新人民軍 (CPP/NPA) 一樣，祈禱團也被國際社會公認為是一個手段血腥的恐怖組織。

祈禱團在東南亞海島地區擁有廣泛的細胞組織，並且活動頻繁。例如試圖在新加坡製造連環恐怖事件的祈禱團新加坡支部隸屬於馬來西亞祈禱團，同時也與印尼祈禱團關係密切。該組織的暴力行動骨幹除了到阿富汗

巴厘島爆炸案表明：「拉登」仍然活着——如果我們把有膽略也有謀略挑戰西方、能夠勝任製造驚天恐怖事件的那個人叫做「拉登」，那麼「拉登」顯然仍然活着，而且有很多。

在伊朗伊斯蘭革命以及後來的阿富汗塔利班革命影響下，東南亞伊斯蘭教復興運動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建立伊斯蘭教國，廢除憲法，以伊斯蘭法治理國家。全球經濟自由化浪潮也引發了許多憤世嫉俗的政治主張。

接受專業的恐怖活動訓練，也會到就近的菲律賓南部穆斯林游擊隊營地接受訓練。「9·11」事件之後，基地組織和祈禱團加快了在新加坡發動恐怖襲擊的行動部署，這樁恐怖陰謀涉及新加坡多處軍事、政府、民用設施，並且直接受基地組織操控（在阿富汗被炸毀的基地組織骨幹住宅中，搜出了新加坡祈禱團攝製的關於預期作案地點的錄像帶，基地組織在東南亞的暴力專家高茲[Fathur Roman Al-Ghozi]則是這樁未遂行動的具體指導者）。新加坡當局在2001至2002年間搗毀了祈禱團在新加坡的分支機構，從而使這起恐怖陰謀沒有得逞。

為甚麼在東南亞會出現像祈禱團這樣的反西方本土恐怖組織？特別是，其成員的行為動機是甚麼？

二 伊斯蘭教復興運動

可以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特別是1970年代以來日益壯大的伊斯蘭教復興運動，是包括基地組織和祈禱團這類極端宗教恐怖組織興起的最直接的時代背景。據穆札法爾(Chandra Muzaffar)的分析，宗教復興運動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周期性現象，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在各個宗教圈子裏都有可能發生，例如在馬來西亞的非穆斯林中，近幾十年來也出現了一些宗教復興現象：佛教節日在1960年代受到冷落，但在1980年代變得流行；印度教儀式在1960年代幾乎銷聲匿迹，但在1980年代也捲土重來；與此同時，基督教徒們也正在「重新發現基督」^①。

伊斯蘭教復興運動的起因，主要是穆斯林社群的傳統價值觀和傳統習俗受到國家的工業化、國際化行動的衝擊，在穆斯林中下階層中瀰漫着失

落感、挫敗感和憤怒感，這使得他們在精神上更加求助於安拉，試圖從宗教裏尋求鼓舞和慰藉。進而，嚴苛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觀念得到推廣，而西方的流行音樂、舞蹈、戲劇、電影被視為頹廢放縱，大街小巷充斥着關於個人道德、宗教儀式、對真主的義務、審判日和來世的磁帶和書刊。

在馬來西亞，「達克瓦」(意為傳教)組織大量出現，如馬來西亞穆斯林青年運動(ABIM，其領導人是後來馬來西亞政壇知名人物安瓦爾[Anwar Ibrahim]、澳爾根[Al-Arqam]、馬來西亞穆斯林福利組織(PERKIM)等。ABIM成立於1971年，其成員主要居住在城市化和半城市化地區，多為社會的中等階層，其目標是鼓勵人們去實行真主的聖訓。它組織研究會，對成員進行種種培訓計劃，又出版月刊和書籍，影響很大。ABIM在政治上持激進態度，反對引進外國資本搞工業化，反對賽馬、賭博、彩票、飲酒，反對腐敗，要求擴大公民政治權利；在國際事務方面，ABIM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和阿富汗抵抗力量的聖戰，為伊朗的伊斯蘭革命而歡呼，被馬來西亞政府視為暴亂隱患。

在伊朗伊斯蘭革命以及後來的阿富汗塔利班革命影響下，東南亞伊斯蘭教復興運動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建立伊斯蘭教國(在一國之內或在數國之內)，廢除憲法，以伊斯蘭法治理國家。隨着民主化浪潮的興起，激進的宗教主張也成為政客們屢試不爽的政治動員工具。同時，全球經濟自由化浪潮也引發了許多憤世嫉俗的政治主張(包括極端民族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在眾多發展中國家，貧富差距懸殊；在一些被西方所敵視和轟炸的國家，許多兒童缺醫少藥，營養不良。這些地方，成了仇恨的沼澤、敵

意的淵藪。恐怖組織的出現，就是在這種激蕩的時代和激憤的理念下產生的。恐怖主義問題的本質，既是一個精神焦慮問題，也是一個民生困頓問題，是來自被邊緣化的世界和被邊緣化的社群的被動反應。「9·11」事件表明，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某些西方國家試圖獨享繁榮富足領先，而又不願分擔災難與恐慌，無疑是一種「反全球化」的妄想。

對西方的仇恨還來自西方與本國腐敗的統治集團的不道德勾結，例如美國政府和美國公司對沙特阿拉伯王公貴族和高級官員行賄，為了經濟利益和地緣戰略利益不惜支持腐敗的王室政權。在東南亞的裙帶資本主義體系下，西方公司與本土權貴的勾結也讓民眾深為痛恨；嚴重的貧富不均，與古蘭經和聖訓中濃厚的均貧富思想形成鮮明的對照。因此，恐怖主義問題也是一個國內政治經濟問題②。

三 道德優越感與聖戰—— 殉難意識

伊斯蘭教復興運動建立在一個「神聖—邪惡」二元對抗式的意識形態框架基礎上。極端的道德優越感成為恐怖組織成員重要的行動動機。拉登就是一個這樣的範例，他不僅是沙特國內反國王的人權運動成員，而且放棄富豪生活、廣散錢財，前往阿富汗參加反蘇聖戰，甘願過苦行僧式的生活；後來又無懼美國的導彈襲擊，堅持自己的聖戰信仰，從而在一部分穆斯林當中獲得了很高的道德威望。當西方被表述為污濁、墮落的世界時，對它發動炸彈襲擊就成為一件高尚的「清潔工作」。

歷時十年的阿富汗反蘇聖戰中，有大量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穆斯林從不同地方（中東、北非、南亞、東南亞，乃至歐洲和美國）慨然奔赴戰場，結成了一支在道德理想主義旗幟下的「國際縱隊」。戰後，他們大多成為反西方國際陣營的重要成員，祈禱團、阿布沙耶夫組織、泰南穆斯林游擊隊中的一些骨幹就是當年在阿富汗有聖戰經歷的人（例如基地組織與祈禱團之間的聯絡員漢巴里），至今他們仍維持着一個類似「校友會」的組織網絡。據當事人回憶，由於經費不足，他們到阿富汗之路走得異常艱辛，整個奔赴過程就像是一次朝聖之旅。

1980年，蘇聯入侵阿富汗的第二年，沙特富商之子拉登來到巴基斯坦邊境城市白沙瓦，與阿富汗抗蘇游擊隊領導人取得聯繫，從此，他捐出大量家產來幫助游擊戰，並資助阿拉伯穆斯林前往阿富汗參戰，同時還以建築業巨子的身份為游擊隊修建道路和兵站。阿富汗戰爭結束後，拉登與美國迅速反目成仇。拉登於1998年成立了伊斯蘭反猶太人和十字軍國際陣線，發誓要殺死美國人及其同盟者。2001年，拉登領導的基地組織發動了震驚全球的「9·11」恐怖襲擊。他曾說：「貝督因人〔阿拉伯游牧民族〕的帳篷比美國的摩天大樓更堅固，我們將更廣闊的戰場上與美國交戰。這個戰場就是整個世界！」

印尼聖戰軍領導人賈法爾（Jafar Umar Thalib）與拉登一樣，也曾到阿富汗參加抗蘇戰爭並且結識了拉登。事隔多年後，賈法爾談起那時候的拉登顯得有些不屑一顧，說拉登只是一個小人物，「那個時候他還刮鬍子，精神很空虛，一點宗教知識都沒有」。在賈法爾的心目中，後來的阿富汗塔

對西方的仇恨還來自西方與本國腐敗的統治集團的不道德勾結。在東南亞的裙帶資本主義體系下，西方公司與本土權貴的勾結也讓民眾深為痛恨，嚴重的貧富不均，與古蘭經和聖訓中濃厚的均貧富思想形成鮮明的對照。

利班政權才真正了不起。塔利班的目標是要建立「沒有異教徒的世界」，而賈法爾也發誓要在印尼建立塔利班式的政權，以最嚴苛的伊斯蘭教來進行統治。

菲律賓阿布沙耶夫匪幫的發起人簡加拉尼 (Khadaffi Janjalani)，也曾是阿富汗抗蘇「國際縱隊」中的一員。後來他回到位於菲律賓南部的家鄉，組建了由自己領導的游擊隊，不過阿布沙耶夫以綁架勒索和殺害人質而惡名遠揚，實在有損當年阿富汗「國際縱隊」的名聲。

2001年美國攻打阿富汗塔利班政權加速了恐怖活動的擴散和新聖戰戰士的出現。印尼的伊斯蘭組織以參與聖戰是走向天堂的捷徑為號召，招募勇士赴阿參加抗美戰爭，同時，留在東南亞本地參與反美恐怖行動也是神聖行為。此後，自殺式恐怖行為在2009年7月17日於印尼萬豪酒店和麗思卡爾頓酒店爆炸案中出現，顯示出一種令人高度不安的動向：這意味着這些恐怖份子為了信仰可以在不惜他人生命的同時，也不惜自己的性命。這種自殺式攻擊也很容易造成示範效應，它意味着榮耀、喜悅，以及解脫。

與打了就跑、全身而退的「敵後游擊戰」不同，極端宗教恐怖組織的行動者有不少採取同歸於盡的方式，從而顯示他們的「光明磊落」、「正氣凜然」。此外，他們還把自殺式襲擊當作進入天堂的捷徑，以至於歐洲的報章以調侃的方式說天堂裏的處女已經不夠用了（因為每個烈士都有權享受數十個處女）。在寄宿制宗教學校中，更容易培養出自殺式攻擊者，因為可以從兒童時代就對未來的「薩希德」（神聖的殉難者）進行培養。

「9·11」事件是一個典型的大規模自殺式襲擊，它是由一系列必要的

構件組成的：首先要有難以平息的仇恨存在，這種仇恨成了最初和最根本的動機；仇恨難以通過「正規方式」平息，由此產生了絕望；絕望使仇恨燃燒得難以控制，產生了瘋狂；而別人信誓旦旦地告訴你有一個「天堂」存在，你自然不必害怕捐軀和死亡。仇恨—絕望—瘋狂—天堂，這是一條陡直的、眩目的直線。

2001年9月11日早晨，劫機嫌犯阿爾謝里 (Waleed al-Shehri) 在出發時留下一首詩，詩句稱自己的這次旅行將「高昂頭顱迎接死亡」。「9·11」的劫機者在完成一次詛咒之旅，詛咒這個已經朽壞了的世界。同時這也是一次尋求神聖、尋求皈依之旅，是一個現代世界中的秘密會社成員的自我拯救之旅。在我們的身邊和遠處，宗教的復興和秘密會社的復興逐漸多了起來。人們在現實世界中所失去的，可以在秘密會社中以另一個身份重新得到，在秘密會社裏，人們莊嚴地從事着陰謀工作。人們如果不能在體制內生存，就要去尋找秘密的江湖。處在社會邊緣的人們在激進的秘密組織中找到了神聖感、使命感和歡喜感，獲得了尊嚴和拯救。他們被現實世界所否定，但在這裏獲得了領袖和同志們的肯定。他們中一些人甚至傾心於死亡，因為現實世界普遍的平庸，而殉道行為可以戰勝平庸，照亮這個平庸的世界。

以祈禱團為例，據新加坡政府披露，嚴格的宗師—學生關係使學生對宗師產生敬仰與順從心理，同時祈禱團的秘密會社性質使其成員絕少與組織外人員交往，內部聯絡通常使用隱語和代號，前往阿富汗受訓也是秘密的；他們的生活單一孤僻，很容易接受激進思想。在新加坡政府繳獲的祈禱團內部文件中，顯示了恐怖份子所

「9·11」的劫機者在完成一次詛咒之旅，詛咒這個已經朽壞了的世界。同時這也是一次尋求神聖、尋求皈依之旅，是一個現代世界中的秘密會社成員的自我拯救之旅。

過的「宅男」生活：避免向其他成員透露住家電話號碼，避免將他人的電話號碼告訴家人，包括妻子、工作場所的朋友，不要讓家人知道你的行蹤，你吃了甚麼，你做了甚麼，你的行動（出門和回家、使用的道路、穿着），必須讓人捉摸不定，等等^③。在祈禱團的行動準則下，很容易出現一批「宅男」式恐怖份子。

值得一提的是，社會中等或中下階層的沮喪、惶恐、騷動等心理畸變，往往可能使他們成為恐怖活動的先鋒。歷史經驗表明，從事秘密恐怖活動的成員常常來自社會的中等階層，如沙俄時代的民粹派份子、意大利的紅色旅 (Brigate Rosse)、日本的赤軍、基地組織和祈禱團的骨幹等。據印尼警方透露，巴里島爆炸案的嫌犯是一批精通電腦的伊斯蘭教徒，為首的沙姆特拉是一名工程師，其他嫌犯包括一名電子專家、一名教師和一名宗教學校的畢業生。新加坡〈回教祈禱團及恐怖主義威脅白皮書〉披露：祈禱團新加坡分部的成員智力正常、職業體面，有經理、科技人員、商人、技工、督工等，並不是愚昧無知、一貧如洗的社會成員。因此，必須從精神方面去尋找他們參與恐怖組織的動機。白皮書還指出，祈禱團有些成員是利他主義者^④。這些現象都值得人們深思。

由此可以推測：二十一世紀如果發生世界大戰，它可能肇源於精神層面的鴻溝。物質利益層面的、領土層面的爭端，終歸是小打小鬧。基於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的教訓，基於令人生畏的核戰失控前景，大多數人會覺得犯不着為了這些皮毛去打一場同歸於盡式的世界大戰。只有擁有彼岸世界並對現實世界絕望的人們，才會覺得同歸於盡沒甚麼了不得，因為還有

別的「去處」，犧牲的剎那，立刻會有天使的接引、處女的環繞。這種心態和當代某些發達國家裏的一些「相約自殺」個案有相似之處——擺脫現世肉身痛苦，追求澄明永樂之境。

此外，上述恐怖主義的跨國擴散案例也在警示世人：冷戰結束後，人們的安全感反而降低，冷戰時期人們至少能預料到危險將來自何方、敵人是誰，而現在卻不知何時何地就會遭遇危險，並且敵人可能是任何一個陌生人，他甚至還對你微笑過。但是如果反恐措施過於集中在以暴易暴，那麼恐怖份子可能將愈反愈多，那些新生的恐怖份子也可能因着血仇更加激進，而更恐怖的是人們對他們所知更少。

現代社會的病就是離散、漂浮、迷失、普遍的平庸、去神聖化。現代社會製造了許許多多的陰鷙的旁觀者，而佔人口大多數的我們，則漠然地旁觀着這些陰鷙的旁觀者，等着他們製造重大新聞。

社會中等或中下階層的沮喪、惶恐、騷動等心理畸變，往往可能使他們成為恐怖活動的先鋒。歷史經驗表明，從事秘密恐怖活動的成員常常來自社會的中等階層，有些成員是利他主義者。

註釋

① Chandra Muzaffar, "Islamic Resurgence and the Question of Development in Malaysia", in *Reflections on Development in Southeast Asia*, ed. Lim Teck Ghee (Singapore: ISEAS, 1988), 22.

② 參見莊禮偉：〈「9·11」揭秘：起源於沙特國內矛盾〉，載《地球屋檐下：關於人類政治的觀察筆記》（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5），頁36-43。

③④ 〈回教祈禱團及恐怖主義威脅白皮書〉，轉引自《聯合早報》，2003年1月12日。

莊禮偉 廣州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教授